

# 市场经济背景下畬族散居化的特点

方清云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纵观畬族散居化的历史,我们发现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畬族散居化呈现出新特点:从求生存型散居转变为求发展型散居;从向偏远封闭的山区、半山区散居转变为向平原、城市和沿海城市散居;从刻意模糊本民族意识到大力彰显本民族意识。这表明我国畬族的自主意识、发展意识、民族意识正在逐步增强。

**关键词:**畬族;散居化;特点

**中图分类号:**K281/2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508(2012)02-0001-03

引论:“散居化,从字面意义来分析,代表着迁移之后形成的一种分散化居住状态。散居化表现在特定民族身上,是指某一民族成员离开自己原来的居住区域,迁移到其他地方居住后而形成的一种民族人口分散分布状态。”<sup>[1]</sup>散居化是世界各民族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民族的散居化既是本民族自我发展和完善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是一种平等竞争的利益经济,要求各经济主体在追求利益过程中产生的矛盾,通过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来解决。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也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和开放性的一般特征。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各少数民族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其人力资本的流动具有地位平等、权利平等、参与机会平等的特点,因此各少数民族散居化在动机、方式、路径等方面也随之发生变化。

畬族是散居于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少数民族,除浙江省景宁畬族自治县之外,其余畬族主要以散杂居的形式分布于我国的闽、浙、赣、粤、皖所辖的45个民族乡镇。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畬族总人口为70.96万人,分布在我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无论从畬族的历史还是现状来看,散居化都是贯穿畬族发展进程的显著特征。“迁徙贯穿着畬族及其先民两千年的历史”“迁徙是畬族及其先民最突出的特征”<sup>[2]</sup>;“畬族在长期的旧社会里,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跋涉向远方迁移呢?而且这种迁移的漫长过程,竟持续达千年之久,这不能不是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sup>[3]</sup>,众多研究表明,一部畬族的发展史就是畬族不断迁徙、不断散居化的历史,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畬族散居化出现了与传统散居化迥异的新特点。

## 一、市场经济前畬族散居化的历史及特点

畬族的族源可谓众说纷纭,有“畬瑶同源说”、“武陵蛮说”、“古代越族后裔说”、“福建土著‘闽’族后裔说”等<sup>[4]</sup>,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迟至公元7世纪初,畬族人民就已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到元、明、清时期,畬族则陆续迁徙到闽东、浙南、赣东北等地的山区和

半山区。市场经济实施前,畬族散居化历史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1. 唐宋元明清时期畬族的散居化。唐宋元时期的散居,是在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过程中进行的散居。史书记载畬族人民反抗斗争最早发生在唐初,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封陈政为“朝议大夫统岭南行军总管事”,“率府兵三千六百将士……前往七闽百粤交界绥安县北方”<sup>[5]</sup>。元朝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封建统治者采取软硬兼施、军事打击和诱骗招抚等政策瓦解分化起义军致使历次畬族起义以失败告终。元朝对起义的善后处置比较慎重,例如至元二十一年黄华起义失败后,元朝统治者“放福建畬军,收其军器,其部长于近处州郡民官迁转”,对参加起义群众“有恒产者放为民,无恒产者与妻子者,编为守城军”<sup>[6]</sup>。总之,唐宋元时期(尤其是元朝)畬族散居化的特点主要有:第一,为躲避战祸而迁徙;第二,随着起义队伍辗转而迁徙;第三,封建统治者的强制性移民。

明清时期是畬族古代史中迁徙最为频繁的时期,畬族迁徙的风气尤盛,“畬族迁徙活动频繁,迁徙路线复杂,迁徙范围广泛,几近遍及闽、浙各地山区和赣、皖部分山区。”<sup>[7]</sup>以浙江畬族迁入情况为例《浙江省少数民族志》<sup>[8]</sup>中列举了90支畬族支族从福建迁入浙江的时间,其中唐朝迁入一支,明朝迁入四十七支(从公元1375年至1644年),清朝迁入三十支,南宋迁入一支,元末明初迁入一支,迁入时间不详的十支。早在民国时期,学者何联奎先生就提出畬族散居化的原因首先源于“畬民随山种插”的“经济的或环境的原因”<sup>[9]</sup>的观点。认为由于畬族长期采取刀耕火种、去瘠就腴这种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游耕模式,迁徙是保证族群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明清时期的生产力发展了,畬族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相对安定富足了,反而加剧了畬族的散居化进程。这一时期的散居化具有追求经济发展的特点。

2. 近代畬族的散居化。近代的时间跨度为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时期畬族散居化有两个显著的时代背景特点。

第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基金项目:201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批准号10JZD0031),子课题名称:市场经济与城市(镇)化背景下的散杂居少数民族政策研究。中南民族大学校级重点科研项目“散杂居畬族的文化变迁与和谐社会的构建”(YSZ08018)

收稿日期:2011-08-12

作者简介:方清云(1977-),女,湖北省武汉市人,中南民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散杂居民族关系,畬族研究。

的压迫,畬族人民受到的压迫空前深重。1840年之后,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在我国闽、浙一带地商品倾销,破坏了畬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给他们苎麻、蓝靛、茶叶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次封建反动统治的经济压迫十分沉重,苛捐杂税五花八门,畬族人民丧失土地的程度越来越高。最后畬族人民还得逃避国民党的“拉丁抓夫”的苦差。在这种情况下,畬族人民或者揭竿而起,在斗争失败后被迫向反动势力薄弱的区域散居;或者尽快地向着闽浙赣交界处更加偏僻的大山深处迁徙,以躲避压迫和剥削。

第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畬汉贫苦人民加入到反封建反压迫的革命斗争中。在党实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策略后,江西、福建、广东、浙江、安徽等地的畬族人民,全方位地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中去,大多数的畬族居住区成为革命根据地。仅就福建闽东来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畬族村庄都是革命据点。一方面,“畬族民族特性的最精要之处是热爱自由”,“敢于为反抗强权暴政而流血牺牲”<sup>[10]</sup>;另一方面,畬族不仅分布于各省的边界地区,而且分布的地区属于我国东南丘陵地带,山峦起伏的险峻地形,使畬族居住地成为易守难攻关口,“这正是我党的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以弱敌强的最为有利的地形依托。”<sup>[11]</sup>近代畬族人民不仅踊跃地参加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并且随着斗争的开展转战全国,例如闽东上杭县在1938年北上抗日的新一军三支队六团中有畬族指战员218人,还出现2名共和国的将军蓝庭辉和雷钦。<sup>[12]</sup>

近代畬族散居化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原因,一部分畬族人口为了躲避三座大山的压迫向着更加封闭的山区迁徙;另一部分畬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新四军和解放军的队伍转战全国。

## 二、新中国成立后直至市场经济实施之前的散居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畬族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与其他民族平等的政治地位,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是畬族走出山区,散居到平原、到全国各个城市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但是由于畬族所在地区多为闭塞山区,发展的基础薄弱,加之党对民族地区的扶持和推动力量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因此直到我国市场经济实施之前,各畬族地区社会发展变迁仍然十分缓慢。

这一时期,畬族散居化的主要形式是在党和政府各项优惠政策的扶持和指导下完成的计划性散居。畬族人民通过这种方式,从自然环境十分恶劣,不适宜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山区搬迁到土壤肥沃、地势平坦的地区,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生活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以福建省福安市为例,“50年代初,人民政府在为畬族老区人民重建家园时,经过了民意调查,将部分畬族迁出大山,迁入地势开阔的平原地区。”“穆云乡洋坪村就是50年代的新建畬村”,“当时共兴建了10个洋坪村这样的畬族新村,用以安置从山区或小村迁入平原或大村的畬族农户。”80年代,福安畬族又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政府指导下的计划搬迁,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畬族聚居区,“福安畬族社区共搬迁兴建畬族新村21个,搬迁重点是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急待搬迁的畬村”。<sup>[13]</sup>

## 三、市场经济背景下畬族散居化的特点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各民族一律平等被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畬族人民获得了与其他55个民族同等的

平等地位。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畬族也随之进入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浪潮。在市场经济作用下,畬族人民主要以进城务工或进城经商的方式,自觉地经济发展落后的区域进入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畬族传统居住的区域浙江省和广东省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畬族人民离开所处的乡村地区进入沿海开放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族缘优势。以福州为例,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该市共有畬族人口43772人,对比该市第四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我们发现“福州畬族人口10年中净增1881人,增长率为4%,年均0.4%。其中,城市人口增加2811人,是10年前的3倍;而农村人口则减少880人,主要是进城经商或务工。”<sup>[14]</sup>此外,调查显示散杂居于中部农村地区的畬族人口也纷纷流入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快的城市,通过进城经商和务工来脱贫致富,谋求进一步发展。

综观畬族散居化的历史,我们发现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畬族散居化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

1. 从求生型散居转变为求发展型散居。郭志超先生在归纳总结前人研究成果之后,对散居原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主要包括“传统劳动方式是畬族迁徙的根本原因;《开山公据》塑造的更山徙居的文化图式;封建政府的政治压迫和军事镇压迫使畬族迁徙;封建政府对畬族的强制性移民;封建社会的经济剥削和超经济盘剥造成畬族迁徙;客家先民迁入与畬族迁出;特种产业带动的迁徙”<sup>[15]</sup>。我们认为,无论是为了逃避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还是迫于低下生产方式带来的生存压力,古代和近代畬族的散居都是为了求生存而迫不得已的迁徙。笔者曾经在江西省贵溪市樟坪乡调研得知,新中国成立前,畬族的迁徙过程是非常艰苦的,扶老携幼在崇山峻岭中穿行,以野果、树根树皮充饥,一旦掉队则会在毒虫猛兽的侵袭中丧命,真可谓九死一生。试想如果不是遭遇灭亡族灭种的灾难或困境,他们又何苦铤而走险呢?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进入城市的畬族人民,其自主性在散居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很多畬族人口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入北京、上海,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寻求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笔者在江西等地的调研显示,畬族人民进入东南沿海城市打工的动机呈现多元化,有的是为了赚钱盖房结婚;有的是为了赚钱供子女上大学;有的是为了年轻的时候出去开拓眼界;有的是为了学习技术和积累资金回乡创业。总之,在信息交流频繁、交通便捷的时代,畬族人民散居更多不是基于“生存理性”,而是基于“发展理性”。

2. 从向偏远封闭的山区、半山区散居转变为向平原、城市和沿海城市散居。历史上畬族是一个典型的山居民族,“分布的大部分地区属于东南丘陵地带,地势大致自西北向东南沿海倾斜,山脉都是由东北到西南走向。主要山脉有闽、浙、赣三省交界的仙霞岭,闽、赣交界的武夷山和杉岭,海拔都在1500米左右;其余海拔也在500—1500米之间。闽东海拔在1000米以下的丘陵山地占90%以上,浙南的丘陵、山地也很多,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sup>[16]</sup>与汉族相比,畬族人民不仅遭受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饱受了战乱之苦,还必须面对“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和歧视。自范晔的《后汉书·蛮夷

传》中记载了“盘瓠传说”后,一些大汉族主义者便对畲族人民借机进行侮辱。他们将畲族盘瓠图腾传说歪曲地等同于现实,并借汉文中对“犬”的不好说法,对畲族人民进行诽谤和诬蔑。例如浙江景宁东弄村畲民过去被汉人侮辱为“畲客儿”、“畲客婆”、“畲客牯”、“畲客骨”、“小姓人”。浙江平阳县畲区流传着这样的歧视性民谚:“无人找马,无马找畲主”;“畲客婆,越做越无;畲客牯,越做越苦”;福建宁德,历史上在大汉族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歧视下,畲族被诬称为“老畲客”、“臭畲仔”、“畲母”、“畲婆”、“死畲人”等等。政治上的封建压迫,文化上的“大汉族主义的歧视”共同加快了古代、近代畲族人民不断从平原迁徙到山区、再到更偏远的山区,去寻找理想中人人平等的“世外桃源”步伐。

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追逐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在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下,畲族人民为了追求自身劳动力资本的利益最大化,也纷纷向非农业和沿海地区流动。我国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畲族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这些富余劳动力受到沿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吸引,纷纷离开贫穷落后的乡村,进入经济发展迅速的沿海城市。他们不但通过打工赚到钱,改善了家乡亲人的生活,部分有一技之长的畲民还在城市扎下根,将家人从农村搬入大城市。这部分畲族人口不愿意充当城市的过客,他们有执着的城市梦,更有留城的意愿和为之奋斗的积极性和内驱力,表现出了现代畲族散居的都市化特点。

3. 从刻意模糊本民族意识到大力彰显本民族意识。众多研究表明,传统畲族散居化的历史,就是一部畲族反封建、反压迫、反歧视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畲族作为少数民族,生产力水平低,民族自卑心理明显,他们与外族接触时采取回避或刻意模糊本民族身份的态度,不愿意提及自己的民族身份。历史上山区畲民经营出售土特产品,常将狩猎获品、木炭、柴草、扫帚、竹子、蓝靛、木材、药材、及筐筐、蜂蜜、鱼、豕、鸡等,作为小商品出售,以换回铁农具、盐、米、布、妇女装饰用品等生活必需品。<sup>[17]</sup>但是他们在与汉族进行交易时,一般也不与汉族人多交谈,“入市贸布易丝,率俯首不敢睥睨”<sup>[18]</sup>。这种情况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有影响,在1956年我国进行民族识别的时候,部分畲族还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民族身份,这是畲族历史上受到“大汉族主义歧视”的心理阴影所致。

“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的四种‘li’得以释放出来,即‘利’、‘力’、‘理’、‘立’。”“而上述四个方面体现在对人的发展要求上,即是要人成为‘经济人’、‘能力人’、‘理性人’和‘独立人’。这就要求人的多方面能力的协调发展,人的发展的全面化”<sup>[19]</sup>市场经济为畲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更激发了畲族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今天的畲族以自己民族的文化为自豪,他们不但乐于向周边非本族人介绍自己的民族文化,还抓住一切机会大力宣扬本民族文化。尤其是民俗特色旅游开始之后,畲族人民看到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和经济价值,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更加引以为豪。他们纷纷要求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提出将畲族民歌、刺绣、服饰等传统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传承和发扬光大;畲族中的精英分子不断写文章来扩大本民族传

统文化的影响,号召每一个畲族人民都来为畲族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他们组织召开全国畲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创办畲网、发出了《畲族自救文化工程书》<sup>[20]</sup>等。2010年7月30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标志着畲族开始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畲族的传统文化。

市场经济背景下畲族散居化进程中出现了很多新特点,表明畲族的自主意识、发展意识、民族意识正在逐步增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畲族定能顺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潮流,实现从传统型散居向现代型散居的平稳过渡,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特色鲜明的重要一元。

#### 参考文献:

- [1] 陆平辉,康占北.中国民族散居化的历史与原因考察[J].贵州民族研究,2008,(05).
- [2] 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74—75.
- [3] 吕锡生.畲族迁移考略[J].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少数民族,1981,(09).
- [4] 《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畲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3—17.
- [5] 薛凝度,吴文林.云霄厅志:卷一七“艺文”[M].1816(嘉庆二十一年)修.
- [6] 宋濂等.元史:卷一三“世祖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7] 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81.
- [8] 浙江省少数民族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少数民族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 [9] 何联奎.畲族的地理分布[J].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民族问题研究室.民族学研究集刊(2).
- [10] 方清云.论畲族的民族特性及形成原因[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03).
- [11] 钟健英.略论畲族人民投身于党领导下革命斗争的历史特点[J].福建史志,1998,(01).
- [12] 闽东畲族民族历史[EB/OL].2009-06-24. [http://www.ningde.gov.cn/wsbs/tongdao/shaoshuminzhu/shaoshuminzuwenhua/1754\\_4.html](http://www.ningde.gov.cn/wsbs/tongdao/shaoshuminzhu/shaoshuminzuwenhua/1754_4.html).
- [13] 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福安市畲族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314.
- [14] 张天禄.福州畲族志[M].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
- [15] 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96—104.
- [16] 《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畲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 [17] 陈国强,等.畲族社会历史调查[M].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138—151.
- [18] 范绍质.长汀县志:卷三三“瑶民纪略”[M].光绪五年刊本.
- [19] 张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人的精神世界探究.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论文,2004:4—5.
- [20] 钟敏贤——畲族自救工程策划书[EB/OL].2007-05-19.